

二十世纪古籍索引编制概述

陈东辉

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张士佩编制的《洪武正韵玉键》,具有索引所必备的要素,乃我国索引之滥觞。同时,《两汉书姓名韵》、《本草万方针线》、《历代纪年韵览》、《史姓韵编》、《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皇清经解敬修堂编目》、《皇清经解检目》、《式古堂目录》、《说文通检》等明清时期编制的索引,都具有较大的价值和影响。

迨及二十世纪,古籍索引的编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阶段。索引编制者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索引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借鉴、利用西方近代先进的索引编制经验和技術,并在实践中取得卓越的成效。二十年代还兴起了具有较大影响的“索引运动”。“索引运动”由万国鼎提出,胡适、何炳松、叶圣陶等一批学者撰文提倡并亲自编纂索引,倡导科学的读书与研究方法。史学家何炳松曾于1925年在《史地学报》第3卷第8期发表《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一文,具体地提出了编制古籍索引的若干设想。这一时期影响最大、泽溉至广的古籍索引,当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制的一系列引得。从1931年2月至1950年3月,引得编纂处共编制了《说苑引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道藏子目引得》、《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尔雅注疏引书引得》等四十一种引得正刊,《毛诗引得》、《杜诗引得》、《论语引得》、《荀子引得》等二十三种引得特刊(附原文者称特刊),除《引得说》(洪业著)着重论述编制古籍索引的方法外,

各种引得合计六十三种,其编制者中有洪业、聂崇岐、齐思和、赵丰田、郑德坤、周一良、翁独健、许地山等著名学者。这些引得系统性较强,就所选古籍而言,遍及经、史、子、集,举凡四书五经、前四史、先秦诸子等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权威性典籍已囊括其中,从而给历代古典要籍大多配置了索引。就其内容和功用而言,既有逐字引得和查检重要词汇的引得,同时还有查检书名、篇名、类名的引得和查检传记资料的引得,形式多样,颇便学人。这批引得的出版,可谓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中空前壮伟的系统工程,它既使古籍索引编制工作登上了一个新台阶,也为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便利,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再则,中法汉学研究所(后改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于1943年至1952年间陆续编制的《论衡通检》、《吕氏春秋通检》、《风俗通义通检》、《文心雕龙新书附通检》等十四种通检也有较大影响。此外,蔡廷干编制的《老解老》(系《老子道德经》的逐字索引),陈乃乾编制的《四库全书总目索引》,叶绍钧编制的《十三经索引》,钱亚新编制的《太平御览索引》,陈鸿飞编制的《册府元龟引得》,王重民等编制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平图书馆编制的《清代文史笔记子目分类索引》,邓元鼎等编制的《宋元学案人名索引附异名索引》,张明仁编制的《宋元明清四朝学案人名索引》,顾颉刚主编的《尚书通检》,杨殿珣编制的《石刻题跋索引》,梁启雄编制的《二十四史传目引得》,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制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庄鼎彝编制的《两汉不列传人名韵编》,王祖彝编制的《三国志人名录》,商务印书馆编制的《十通索引》、《佩文韵府索引》,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编制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施廷镛主编的《丛书子目书名索引》,陈德芸编制的《古今人物别名索引》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版的颇有影响的古籍索引,至今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为学术界所重视。

五十年代至今,中国大陆地区共编制了近两百种古籍索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古籍索引的编制与其它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一

样,曾经几度起伏,在曲折的道路上向前发展,成就也是不容低估的。在“文革”以前编制出版的五十余种古籍索引中,较为重要者如周祖谟校笺、吴晓铃通检的《方言校笺及通检》,陈乃乾编制的《清代碑传文通检》、《室名别号索引》,上海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丛书综录》,商务印书馆编制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朱士嘉编制的《宋元方志传记索引》,马念祖编制的《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编制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文苑英华作者姓名索引》,商承祚等编制的《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杜信孚编制的《同书异名通检》等,代表了当时古籍索引编制的新水平。十年动乱结束后,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迈入全新的发展时期,由逐步恢复以至大力加强,陆续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古籍索引,如陆峻岭编制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罗伟国等编制的《古籍版本题记索引》、王肇文编制的《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朱保炯等编制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杨廷福等编制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杨震方等编制的《历代人物谥号封爵索引》、常振国等编制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者篇目索引》、洪文涛等编制的《说文八种单字索引》、戴青山编制的《广雅疏证索引》、傅璇琮等编制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方积六等编制的《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施廷镛主编的《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阳海清编制的《中国丛书综录补正》、上海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丛书综录补编(征求意见稿)》(油印本)、苏州大学文献研究室编制的《古籍丛书资料综合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参考阅览科编制的《四部丛刊索引》和《万有文库索引》、蔡勇飞编制的《〈四部备要〉〈万有文库〉〈丛书集成〉高低法目录通检》、陈宏天等编制的《诗经索引》、周钟灵等编制的《韩非子索引》、程湘清等编制的《论衡索引》、方龄贵编制的《元朝秘史通检》、马绪传编制的《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史成编制的《全唐诗索引》、王秀梅等编制的《太平广记索引》、罗锡厚等编制的《太平广记索引》、李剑雄等编制的《艺文类聚索引》、许逸民编制的

《初学记索引》、朱迎平编制的《文心雕龙索引》、王芸孙编制的《中国旧诗佳句韵编》、武秀珍等编制的《万首唐人绝句索引》、孙公望编制的《唐宋名诗索引》和《唐宋名家词检索大全》、吴汝煜主编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张忱石编制的《全唐诗作者索引》、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制的《全唐诗重篇索引》、李复波编制的《词话丛编索引》、吴藕汀编制的《词名索引》(重订本)、高喜田等编制的《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何冠义等编制的《骈字类编索引》、钟夫等编制的《杜诗五种索引》、唐文等编制的《李贺诗索引》、仇永明等编制的《东坡词索引》、张忱石编制的《唐会要人名索引》、王壮弘编制的《六朝墓志检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店编制的《二十五史纪传人名索引》、尚恒元等编制的《二十五史谣谚通检》、高秀芳等编制的《北京天津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吉林省图书馆等编制的《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方品光编制的《福建通志传记兼艺文志索引》(油印本)、池秀云编制的《山西通志人物传记索引》、谢正光编制的《明遗民传记索引》、赵永复编制的《水经注通检今释》、顾植山主编的《中医经典索引》、杜信孚等编制的《同名异书通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仲湘等编制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与中华书局、巴蜀书社重新影印的《古今图书集成》配套出版,曾荣获全国二次文献优秀成果奖),结构严谨,体例新颖,是一部高质量的类书索引,代表了当今古籍索引编制的水平。《永乐大典》以韵系字,以字立目,查检极不方便。有远见卓识的钱钟书先生于1972年提出应为《永乐大典》编制一部准确而完备的索引。在钱先生的具体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栾贵明依据中华书局版《永乐大典》,历时十余年,呕心沥血,艰苦备尝,终于编制成了《永乐大典索引》,洋洋三百万言,作家出版社定于1997年出版。《骈字类编》只列骈字、集章句,无任何音义训释,为它编制音序索引难度较大,需要具备较为高深的古汉语知识。程千帆等据中国书店影印本《骈字类编》而编制的《骈字类编音序索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兼容了古籍整理和索引编制两项工作,其内容和性质远远超

出了纯检索目的之索引,作用与意义都很大,同时,与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相配套。《二十四史记传人名索引》和各史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正在陆续出版。此外,苏州大学图书馆编制的《清史稿人名索引》(油印本),何英芳编制的《清史稿纪表传人名索引》,也已由中华书局于1996年刊行。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达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后改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于1982年初恢复工作,接着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1983年9月成立。许多高校创办了专门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古籍索引的编制随之日益受到重视,其出版数量更趋增多,质量亦有所提高。据曲静涛《十五年来我国索引编制出版状况和发展构想》(载《中国图书馆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中国大陆地区在1977至1991年的十五年间,共出版了一百五十三种索引,其中古籍索引有八十七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九。在这八十七种古籍索引中,有二十四种为影印和再版的;另外六十三种是新编出版的,占新出版索引一百二十九种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八。由此可见,古籍索引所占比重是较大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制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指出:“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的《引得》、中法大学编印的《通检》,对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可全部重印。应大力发展索引的编制工作(包括综合索引和专题索引),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列入该规划的古籍索引有许多种,如《宋诗总集若干种作者索引》、《明诗总集若干种作者索引》、《清诗总集若干种作者索引》、重要文学古籍索引(如《楚辞索引》、《文选索引》、《白居易诗索引》、《太平广记索引》、《全唐诗重出作品综合索引》等)、《近代经世文编索引》、《北朝五史人名索引》、《南朝五史人名索引》、《新旧唐书人名索引》、《宋史人名索引》、《辽史人名索引》、《元史人名索引》、《明史人名索引》、《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永乐大典引书索引》、《室名别号索引》(增补)、《唐代碑传文通检》、《史记地名索引》、《汉书地名索引》、《后汉书地名索引》、《三国志地名索引》、《资

治通鉴制度名物索引》、《资治通鉴地名索引》、《册府元龟人名索引》、《明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重订十三经索引》、《韩非子索引》等,不少种已陆续问世。《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年—2000年)》也列有多种索引,如《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册府元龟隋唐五代人名索引》、《永乐大典引书索引》、《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人名索引》、《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1991年12月的中国索引学会,积极组织编制包括古籍索引在内的各类索引,并专门设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史”等研究室,为繁荣与发展中国大陆地区的古籍索引事业作出了有益贡献。

中国台港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在古籍索引编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高度重视古籍索引的编制,是台港地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显著特色之一。昌彼得等编制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王德毅编制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合编)、《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历代诗史长编人名索引》、《清人别名字号索引》,黄福鑫编制的《史记索引》、《汉书索引》、《后汉书索引》、《三国志索引》,庄为斯编制的《唐律疏义引得》、《骈字类编引得》、《管子引得》、《韩非子索引》,诸家骏编制的《四部备要索引》,周法高主编的《广雅索引》、《广雅疏证引书索引》,金荣华主编的《敦煌俗字索引》,张以仁编制的《国语引得》,王恢编制的《太平寰宇记索引》、《汉书地理志图考通检》,庄芳荣编制的《丛书总目续编》、《中国类书总目初稿:书名、著者索引篇》,周骏富编制的《清代传记丛刊索引》,陈铁凡等编制的《宋元明清四朝学案索引》,台北文海出版社编辑部编制的《全唐文总目及作者笔划索引》,章群等编制的《古今图书集成中明人传记索引》,潘英编制的《中国上古国名地名辞典及索引》,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为配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而出版的《四库全书索引丛刊》(已印行《四库全书说部篇题分类索引》、《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等十种),台北明文书局出版的《明代传记资料丛刊》和《清代传记丛刊》

所附的索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丛书集成新编》和《丛书集成续编》所附的索引,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的《百部丛书集成》、《四部分类丛书集成续编》和《四部分类丛书集成三编》所附的索引,台北新兴书局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所附的索引等,都具有较高质量,颇为学界所重。台湾学生书局于1975年出版的郑恒雄编制的《汉学索引总目》,收录清末至1975年4月底海内外编辑出版的汉学索引七百九十种(含附在书后者),其中约有三百种古籍索引(含附在书后者),亦很有参考价值。

同时,中国台港地区(主要是台湾地区)还翻印了大量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编制出版的古籍索引,促进了学术交流,加快了古籍整理研究的步伐。如蒋致远主编、台北宗青图书公司出版的《汉学索引集成》,所收多为日本学者于1912年至1949年期间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甚便学人,功用很大。又如日本学者山根幸夫曾于1971年编制了《日本现存三百种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稿》,油印问世。原稿是据明人姓名之威妥玛氏(WADE)汉字罗马拼音顺序编排,多有拼音不合者,使用不便。经查此类书籍在台湾亦可见到十之八九,台湾大化书局遂依油印本原编各方志,加注台湾有关收藏单位,并改用《康熙字典》笔画部首顺序,重编中日两国通用本,定名为《中日现藏三百种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于1986年排版印行,堪称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国外汉学研究者对中国古籍索引同样非常重视,结合有关学术研究编制了大量中国古籍索引,其中尤以日本为最。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出版的中国古籍索引约占世界各地所出版的全部中国古籍索引的百分之八十,仅唐代文学古籍索引就达三十八种,其对古籍索引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古籍整理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果。这些索引门类广泛,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领域。有的学者一人就编有多种索引,如著名汉学家佐伯富编制了《资治通鉴索引》(合编)、《中国随笔杂著索引》、《宋代文集索引》、《苏东坡全集索引》、《宋史职官志索引》、《宋史选举志索

引》、《宋史刑法志索引》、《宋史河渠志索引》、《宋史兵志索引》、《元典章索引稿》(主编)、《职源撮要索引》、《官箴目次综合索引》(合编)、《明律国字解索引》等十余部高质量的中国古籍索引。就其范围而言,可谓包容四部、网罗群籍。论其大者,有包括一朝一代乃至全史的;言其小者,限于某部中特定章节的。又如矢岛玄亮也以一己之力,编制了《百子全书人名索引》、《百子全书书名篇名谚语索引》、《百子全书地名官职爵名引用书名索引》、《清朝随笔三十二种索引》、《中国随笔杂著四十一一种索引》、《十三经经名篇名引用书名索引》等多种中国古籍索引。再如斯波六郎等编制的《文选索引》,将《文选》中的一至三十三画字每字做出索引,并有“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文选篇目表”、“篇目索引”、“文体分类表”、“文体的说明”、“作者索引”等附录,最后还附作者撰写的“旧钞本文选集注卷第八校勘记”。这部索引多达四册,先后花了二十年时间方编完,质量甚高。

除了个人之外,日本许多学术机构对中国古籍索引的编制也十分重视,其中首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索引编辑委员会。这个机构不但为研究者出版中国古籍索引,造就了许多像佐伯富这样对中国古籍索引有卓越贡献的汉学家,而且以集体之力量编制了大量为日本其它学术机构所无法企及的中国古籍索引,功不可没。此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阪市立大学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东洋文库、采华书林等单位也都编制和出版了许多中国古籍索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古籍索引中,有不少是就某一专题而编制的系统的成套索引,为查检某一专题领域的文献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也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乃日本编制中国古籍索引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平冈武夫等编制的《唐代研究指南》,共计九种,即《唐代的行政地理》(系《新唐书》、《旧唐书》、《元和郡县志》等书的地名索引)、《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分资料、地图、索引三篇。资料篇收录《唐两京城坊考》、《长安

志》、《两京新志》等书。索引篇是根据资料篇中的内容,将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分项目表列出来,并记出各书的卷数和页数)、《唐代的诗人》(系《全唐诗》及〔日本〕上毛河世宁所辑的《全唐诗逸》的作者姓名索引)、《唐代的诗篇》(系《全唐诗》、《全唐诗逸》、《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所收诗的篇目索引)、《李白的作品》(系原始文献)、《李白歌诗索引》(系李白诗歌的篇目首字索引和篇名人地名索引)、《唐代的散文作家》(系《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等书的作者姓名索引)、《唐代的散文作品》(系唐、五代散文的篇目及作者索引)和《唐代的历》(系唐代的历表)。大阪市立大学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编制了一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语汇索引,包括《红楼梦语汇索引》、《金瓶梅语汇索引》、《水浒全传语汇索引》、《儒林外史语汇索引》、《儿女英雄传语汇索引》和《中国古典戏曲语汇索引》等六种。中谷英雄编制的《中原丛刊》,内有《北齐律考·北周律考索引》、《隋律考索引》、《大唐六典职官索引·唐会要目次索引》、《唐律疏议索引项目(第一部:名例)》、《唐律疏议索引(释亲考)》、《养老律索引》等。牧田谛亮等编制的《中国高僧传索引》,则是就《梁高僧传》、《唐高僧传》、《宋高僧传》、《大明高僧传》及《新续高僧传续集》等五种高僧传而编制的索引。此外,日本大藏经学术用语研究会编制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规模宏大,1961年始由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陆续出版,已出三十余册。

美国也编制了一些中国古籍索引(如 Glen W·Baxter 编制的《钦定词谱索引》、K·LO 编制的《四部丛刊索引》),尤其引人瞩目之处是在编制中普遍利用电子计算机这一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如 P·J·Ivanhoe 等人早在 1978 年就利用计算机编制了《朱熹大学章句索引》、《朱熹中庸章句索引》、《王阳明大学问索引》、《王阳明传习录索引》、《戴震原善索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索引》等字词索引。法国曾经是域外汉学研究之重地,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以《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后改称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汉学通检提要文献丛刊》的

新名称，刊出了《汉宫七种通检》、《抱朴子内篇通检》、《抱朴子外篇通检》、《夷坚志通检》、《曹植文集通检》（J·P·Diény 主编）等数种。主持该丛刊编制工作的法国学者 K·M·Schipper，个人编制了《道藏著作篇目通检》和《黄庭经通检·内景和外景》。再有，F·J·Chang 编制了《宋代官职名称索引》。此外，英、德、俄、韩等国也编有数量不等的中国古籍索引。

再者值得一提的是，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在古籍整理研究和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年—1995年—2000年）》明确指出：“计算机的普遍使用和微机汉字处理系统的建立，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脱出来创造了条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向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现代化提出挑战。我们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面对挑战。当前基本典籍经过整理，输入微机等工作应扩大试点；同时应积极培训有关专业人才，以推进古籍整理与出版现代化。”又指出：“在今后十年内，应加快古籍整理出版手段现代化的步伐。”1993年冬，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和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共同举办了“海峡两岸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现代化技术研讨会”；1995年7月，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古籍整理研究出版现代化”国际会议。

古籍索引的编制也不例外，目前已有不少这方面的成果，并预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李晓光等采用计算机与人工相结合的办法，据中华书局1985年版点校本《史记》编制了《史记索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全书分单字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援引著作索引、专有名词（包括天文词、年号名、神仙名、学派名等）索引、补遗索引、衍文索引等部分。同时，编制《史记索引》的这套计算机软件业已具备加工处理诸如全部《二十五史》的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计算机室以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为底本，用电脑编制成《论语》逐字索引，并附有《论语

词典校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姚兆炜利用微型计算机为《寒山子诗》编制了逐字索引,并撰有《在微型计算机上对〈寒山子诗〉实现逐字索引》一文,刊布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3期。广州中山大学于曼玲等用计算机编制出《高适诗集》的逐字索引,还撰写了《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古籍索引的体会》,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从1986年起承担全国高校古委会下达的应用微机进行古籍整理研究的试验任务,于1988年编制完成了《〈贞观政要〉综合检索》。武汉大学与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合作研制成功“《论衡》检索系统”,对《论衡》进行了逐词索引的编辑和统计工作。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共同用计算机编制了《儿女英雄传》的虚词索引。深圳大学中文系与电脑中心合作建立了“《红楼梦》多功能计算机自动检索系统”,检索内容包括用字索引、用字频率、双音词索引、双音词频率、介词、连词、副词、助词、量词、四字格成语、修辞手法、人名、职官、诗词、音乐、绘画、戏剧、服装、饮食、园林艺术、室内陈设、心理描写、爱情描写、外貌描写等三十个专题。江苏省镇江市科委和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联合研制了“《红楼梦》大型数据库系统”,实现了对《红楼梦》的原著检索,包括人物检索、物品检索、风景检索、事件检索和综合检索。兰州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室与计算机科学系,将《老乞大》和《朴通事》这两部元明时代朝鲜人学习汉语的课本,用计算机编制成《老乞大朴通事索引》(语文出版社1991年出版),分为单字索引和频度表、单词索引和频度表等部分。上海博物馆电脑室近年来致力于古籍电脑化研究,完成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索引系统”。中华书局自1992年起陆续出版的《全唐诗索引》丛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全面使用电脑编制而成。它属于该室计划逐步完成的中国古曲文献计算机数据库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全唐诗》之外,该室还陆续完成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十三经》、《诸子集成》、《红楼梦》、《明儒学案》等字数以千万计的大型古典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则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据“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电脑化资料库”编制而成，全套共计六十五种，包括一百零二部古籍。该索引可以详细展示某部古籍中所用单字的使用频率以及在句子中出现的具体情况，甚或某字在古籍中的用例、出处等等，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还以电脑软盘形式出版了“汉达古籍索引资料库”，该系统包括古文献资料库、文献用字统计及有关资料、电脑检索程式以及特定造字档（指倚天中文电脑系统未能提供之字形）。安装“汉达古籍索引资料库”后，就可利用家用电脑检阅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再决定研究取向，并可利用系统内附之检索程式，进行文献资料之归纳、分析、统计、比勘等工作，将大为提高研究工作效率。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计算机中心自1984年始，合作进行史籍自动化的研制工作。第一阶段是将《二十五史》中的《食货志》共约六十六万字输入电脑，使之具备年号查询、人名索引、官职索引、地名索引、专用名词索引、节印、统计分析等功能；第二阶段是把《二十五史》的全部内容输入电脑，建立史籍全文资料库。目前已建成“汉籍全文资料库”，包括《二十五史》、《诸子》、《十三经》、《古籍十八种》、《台湾方志》、《文心雕龙》、《佛经三论》、《新清史——本纪》和《古汉语文献》，总计七千六百七十四万二千一百四十八字。另有“汉籍全文资料库”（续）及《台湾档案》、《道藏》（部分）、《近代中国史实日志》、《中华民国史实日志》、《新清史》（续）等资料库正在建立，预计总字数在五千二百二十万以上。

最后，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湘潭大学研制了古籍索引自动编辑系统，即SYBJ系统。这是通用型的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可自动编制古籍的逐字索引、句子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及其它专题索引。湘大已用该系统编制了《宋词别集索引三种》（含秦观《淮海词》、李清照《漱玉词》、朱淑真《断肠词》），系逐字索引。

四川联合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于1991年专门成立了“微机辅助古籍整理研究室”，现在，“汉字索引编纂排版（IDX）系统”已完成研制并投入运行。本系统吸收了DOS操作系统、FOXBASE+系统、方正电子出版系统的长处，并结合索引学、文献学、文字学等方面的知识而研制。其主要特点是：1. 根据汉字索引编纂需要，利用了三大系统中的相关技术，并使之融为一体，从而实现词条标引、编码、排序、排版自动完成；2. 采用人机对话方式，用户按屏幕揭示进行操作，即可完成索引编纂、排版工作；3. 为14000个汉字编了索引码，分为简化字和繁体字两套系统，不仅适应为简化字文献编索引的需要，而且能满足为古代典籍繁体字编索引的需要；4. 凡是能运行FOXBASE+系统和方正（华光）出版系统的微机，均可使用IDX系统。IDX系统代表了当今采用计算机编制古籍索引的新水平。此外，该所还采用计算机编制了《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人名四角号码索引》。

与手工编制相比，用计算机编制索引有简便、快速、详尽、准确等诸多优点，并且可以结合新版古籍的电脑排版、激光照排等先进技术进行编制，同时还能建立全文数据库，使得以前需耗费数年才能编成的大型古籍索引而在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内即可完成，并且其检索功能远远超过供手工检索的有关索引。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古籍索引编制步骤繁琐、费工耗时以及错误较多等问题，促使古籍索引的编制数量成倍增长，质量大为提高，从而给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生机。以战略眼光来看，采用计算机进行编制代表着今后古籍索引编制的发展方向，并将逐步成为古籍索引编制的主要方式，使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产生划时代的变革。建议各极有关领导和广大古籍索引编制人员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学习和掌握计算机等现代科技知识和手段，一俟条件成熟，尽快将其应用到各自的编制工作实践中去，决不能停留于传统的手工操作阶段而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此外，应注意与专职从事计算机工作的科技人员密切合作、相互交流，积极发挥各自的

特长,研制出各种对古籍索引编制更为有效的计算机输入、存贮、检索等系统,使计算机在整理、研究和宏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任重而道远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对中国古籍索引编制的上述回顾,我们首先应该肯定这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大部分重要而又常用的古籍都已有了或详或略的索引,为广大研究工作者带来了极大方便,并逐步积累了不少编制古籍索引的宝贵经验,体例、方法日臻完善。然而从总体而言,目前已经编制的古籍索引与数量庞大的全部中国古籍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并且这方面工作缺乏长远的宏观的规划,系统性不强。就是已经编制的古籍索引,尚有多种在体例、内容、功用诸方面不很完备,有的甚至错讹众多,严重影响了使用。此外,古籍索引的编制出版速度较慢,往往一拖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能适应当今信息化时代的迫切需要。凡此种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繁荣与发展。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客观原因,如众所周知的“文革”等时期的政治性干扰(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地区),如经费短缺、出版困难、读者面较窄、编制手段与方法落后等等;也有主观原因,主要是因为古籍索引的编制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这类技术偏重于细致的寻检和烦琐的统计,容易使人感到枯燥乏味但又得聚精会神、耗费心力,耗费时间,其成果却又常常未能获取应有的重视和评价,更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索引是可有可无的,不视其为学术成果,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古籍整理研究和图书情报工作者不愿承担这个苦差使。上述状况在中国大陆地区似乎尤为严重,笔者认为这是导致中国大陆地区古籍索引相对偏少的关键性原因之一。

作者工作单位:杭州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